

1103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

(第三十二期)

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2年2月1日

目 录

- 李焕同志一生艰苦朴素 陈启文(1)
- 附:走群众喜欢的路,加速消灭血吸虫病
- 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李 焕(11)
- 浙江嘉兴回族 刘重尚 郭成美(19)

李焕同志一生艰苦朴素

陈启文

曾任中共嘉兴地委书记的李焕同志，至今人们还深切地怀念他，称他为共产党人的楷模。

听我母亲陈梅姐说，李焕同志出生在长兴县天平乡李王村中介湾一个富裕家庭（土改时被评为地主），年轻时抛弃家庭优裕生活条件投身抗日战争，领导穷苦百姓打日本鬼子，打伪军、顽固派，难能可贵。

1945年3月，我哥哥陈天根在他启发教育下，参加了长兴新四军，编入县武装总队警卫连通讯班。5月初，因家里种田忙，母亲叫我舅父陈松清赶到长兴县城中山厅，叫我哥哥回家种田。此事，正巧被李焕同志知道了，他很客气地与我舅父谈话，说明共产党新四军为穷人打日本鬼子谋幸福的道理。李焕同志还陪舅父吃饭，把一块大肉挟给了舅父吃。饭后，我哥哥告诉舅父说，刚才一起吃饭的就是李大队长（当时，我们长兴老百姓称县总队长李焕为大队长），舅父高兴地鼓励我哥哥安心地在部队，再也不提回家种田的事了。当天，舅父回家对母亲说：今天到长兴看到了李大队长，一同吃饭交谈，没有一点官架子，穿的是旧蓝布服装，吃饭时还把一大块肉给了我吃。这样好的人当队长，还叫天根回来作啥呢！家里又无饭吃，还是在长兴当新四军好。

我因3岁时死了父亲，我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兄弟长大，很不舍得儿子离开，常常哭哭啼啼。8月初的一个晚上，一个穿着旧

灰色蓝布服装的陌生长条子人，来到我家横屋门口问母亲：陈梅姐在吗？因母亲前几天被伪乡公所叫去盘问过，问陈天根到哪里去了？差点儿吃“老虎凳”，有些怕，不敢说。李焕同志自我介绍说：我是你儿子陈天根的李队长，今天我们到陈桥头剿匪，带信来看看你。天根虽年纪小（时年18岁），但工作很好，我们会照顾关心他的，你不要再叫人去叫他回家了，新四军总有一天会来，不要怕。话未讲完，从陈桥方向远远传来枪声，李焕同志就走了。从陈桥到我家要翻狼山岭，过二条大涧，阴森森二十多里山杂路，李焕同志都是步行的。10月初，从长兴城呈传夫消息，说李大队长率领长兴县机关干部随新四军北撤了。不久，我哥哥从江苏东台来信说，一路平安，李大队长一同行军，同吃，同睡，很关心大家，要家里人放心。此后，部队整编，我哥哥编入华东野战军四纵队十一师三十二团三营八连，分别时李焕同志还鼓励我哥哥好好学习，勇敢杀敌。我哥哥于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中牺牲。后来，我们知道李焕同志也是烈属，其妻程强和两个孩子在南下途中罹难牺牲。当时李焕同志正忙于整训准备南下，组织上征求他意见是否由组织派人去料理丧事，李焕同志回答：“服从组织安排，干革命总会有牺牲，绝不要因此而影响工作。”长兴解放后，李焕同志给我母亲来过信，县民政局发来了《烈属证书》和抚恤金600斤大米，每月我母亲还享受优抚费，横山乡政府还选送我到长兴师范读书，毕业分配到长兴雒城小学当教师。

1953年，李焕同志任中共嘉兴地委工业部长时，农民反映民丰造纸厂黑水放入河中流进稻田，损害稻苗生长，造成减产。李焕同志亲自下农村调查，赔偿农民损失，解决问题。群众反映：“国民

党、共产党同样一扇铁门，可二重天：国民党政府铁门八字开，无钱穷人莫想进去；共产党政府大门全敞开，欢迎老百姓进来”，李焕同志经常下工厂调查研究工作，科学地发展生产。有一次他与中共嘉兴县委分管工业的副书记沈如淙同志俩人骑自行车到东栅丰收农具厂了解情况，召开领导、技术员、工人“三结合”座谈会，讨论工业支援农业生产发展问题。有人提出“要解放农民三弯腰（弯腰插秧种田，弯腰收割，弯腰打稻）的痛苦，就必须把农具厂改为农机厂，生产插秧机、收割机、打稻机，才能发展农业生产。”李焕同志听了这个意见很高兴，立即支持厂里打报告给县里改名为农机厂，并与沈如淙同志研究，加大资金投入帮助该厂生产农业机械，支援农业生产。还有一次，他到嘉兴新嘉铁工厂搞调研，发现该厂单纯生产废铁加工，便与厂领导、技术人员研究，将该厂更名为嘉兴动力机厂，生产“195型”柴油机，既可作农用船上动力，又可作抽水灌溉，排涝抗洪抗旱，还可作收割机、小型拖拉机动力，大受农民欢迎。在厂吃饭，李焕同志不要厂里请客，自己排队吃食堂。

一次，李焕同志在省里开会，连续几天下大雨，获悉长兴、吴兴县山洪暴发，加上太湖水涨，很多农民房屋倒塌，稻田淹没成灾。李焕同志坐立不安，打电话到深夜，与县领导商量防洪排涝措施。第二天会议一结束，连正在生肺病的爱人都不管，直奔长兴、吴兴县抗洪第一线，赤着脚冒着生命危险巡回在太湖缺口，发动群众筑坝加固河堤排涝保生产。一次，李焕同志从省里开会回来，中共嘉兴县委副书记沈如淙同志向县卫生局借了一辆汽车到火车站接他，李焕同志一下火车看出是救护车，说：这汽车是抢救重病人和产妇用的，万一在这个时间里有急病人或产妇可耽误时间了，不能用，

请驾驶员开车回去。说着，李焕同志与沈如淙同志步行到县里。身为中共嘉兴地委书记的李焕同志，对物质生活享受淡薄无缘，多年来一直住在旧式老房子，家里只有一张棕绷床，一只白坯小方桌，一把椅子。同事谭其蔚同志看望他，只好蹲在地上谈话。老谭同志说一声“你怎么不调个大房子呢？”李焕同志风趣地回答说：“住久了，有感情啊！”他从来不让家属子女伸手向机关行政部门要东西，买便宜货，套购国家物资。李焕同志长期患肝病，每当发病重了才进医院看病，住院时总是以一个普通病号出现，听从医师治疗方案，从不以功臣自居，要求特殊医药，住特殊病房，吃小灶等。直到有一次病危，他还是以普通病人就诊。浙江医院门诊工作人员不了解他的身份，看他穿的旧衣服，人瘦苍老像个农民，开始不准他挂号，看着实在病重才给他挂号在急诊室里观察，一个好心领导干部发觉后才帮他搬进病区。

1958年3月，李焕同志带领地、县工作组到嘉兴县净湘乡作血吸虫病专题调查。他与干部群众一起劳动，土埋钉螺，访问血吸虫病人，与血吸虫病患者拍照谈话，召开座谈会，了解到石蟹桥村解放前有19户人家，120人，由于血吸虫病危害，到1949年解放时死亡105人，只留存8户15人，其中还7人大肚子，6个“童子痂”，全村只有一个半劳动力，因小孩患血吸虫病生长发育不起来，全村土地成“荒田漾”。李焕同志听此悲惨情况，心情沉重地说：“我们下决心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而当他看到净湘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反复斗争，已取得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胜利时，又极为兴奋，临走时，还写了一首诗赠给净湘干部和农民，此诗是：

净湘，净湘，

多多回想，
死人浜、荒田漾，
提起从前太凄凉。

净湘，净湘，
如今变样，
人兴旺、丰田漾，
人人心里喜洋洋。

净湘，净湘，
谁来变样，
不是关帝不是神，
原来正是共产党。

净湘，净湘，
大有希望，
只要大家出力做，
定能争得千斤粮。

接着，1958年5月6日至23日，李焕同志到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综合全地区血吸虫病严重流行情况，在会上作了《走群众喜欢的路，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的发言，提出了如何加快速度消灭血吸虫病的措施，毛主席听了他的发言。1959年，经省、县卫生部门鉴定验收，净湘乡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要求，列为浙江省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先进乡。

在六十年代初饿病逃荒的日子里，李焕同志日夜不休息，想的是老百姓。他常对人讲：“我们干革命，目的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现在老百姓生活困难，连饭也吃不饱，我们当干部的有责任，特别是我这个当地书记的要负主要责任。”1960年3月，李焕同志在杭州参加省委六级干部大会。会议期间，他听到嘉兴陶庄公社（现嘉善县陶庄乡）农民缺粮出现饿病逃荒现象，开始坐立不安。会议一结束，他从杭州直奔陶庄、西塘、干窑公社调查，访问农民，所见所闻比在杭州开会时听到的还要严重，饿病死亡了不少人。李焕同志心里十分难过，说：“不应该，不应该啊！我是这个地方的父母官，身为地委书记，老百姓受这么大的苦，我要负主要责任，否则对上对下都难交代。”他还到吴兴县南浔片、长兴县横山公社作调查，发现不同程度出现饿病逃荒现象。有干部反映：“农民无饭吃，捧着肚子饿死，不骂一声共产党”。李焕同志听了心里很难受，农民如此热爱共产党、毛主席，我们却官僚主义作风，没有关心好农民。李焕同志立即召开地委常委会议，统一思想，迅速调拨粮食贷款急救农民。又召开了紧急电话会议，要求各县、公社领导重视安排群众生活。同时，又向省里直言不讳作了汇报，得到省里重视，下拨返销粮，解决部分地区缺粮困难。然后，发动干部群众联系实际总结“三大一公”（大跃进，大办食堂大锅饭，大比武，公有制）、“生产瞎指挥”、“浮夸风”的经验教训。此间，李焕同志还带领工作组到海宁县（现海宁市）伊侨公社搞调查，群众向他反映：“吃大锅饭养懒汉，神仙来当干部也搞不好。生产队规模以自然村为一个队好，看得见，摸得着，产量承包到户，超产奖励有积极性。”李焕同志听了这些话感到很实在，召开地委常委会议统一思想，实事求是地写了《关于

调整生产队规模的调查报告》报省委，得到省委肯定，批转全省各地执行，安定民心，调动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当时，正值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再度刮起“共产风”、“反右倾”，有人担心李焕同志会被“拔白旗”，戴“右倾帽子”，但李焕同志坚持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教导，不谋私利安危，不怕撤职吃官司，敢于谏言上诉说真话、办实事，为嘉兴地区干部党员做出榜样。

一次，李焕同志到嘉善西塘公社搞调查，在西塘酒厂吃饭，他同秘书到大食堂排队买菜。那天吃粥，小菜是一小碗老蚕豆，开始秘书把蚕豆壳剥下吃，看着李焕同志连蚕豆壳都吃进去，秘书不好意思也把蚕豆壳吃下。平时，李焕同志在家里也吃得很节约，告诉家人少买菜，买蔬菜吃，多余菜不能倒掉，要节约。他穿的一件大衣，还是长兴供给制时发的，补丁上叠补丁。一次到省里开会住杭州饭店报到时，门卫看他穿的旧蓝布衣服像个农民，不给他进去，是通讯员谢永兴讲了这是嘉兴地委书记，才让他进去。后来，李焕同志风趣地说：“小谢，看来衣服要穿得好一点，人家当你做大官，就直通无阻了”。大家哈哈笑起来。李焕同志在机关开会工作，不要汽车接送，叫驾驶员休息学习，而自己上下班骑自行车，有时走路。他用的自行车旧了，踏着格格直响，小谢同志到机关行政科去领了一辆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交给李焕同志，李焕说谁叫你去领这车子，我的自行车还好用，你把这新车子退回去。无奈，小谢同志只好把新自行车返还行政科。

1960年7月，我从嘉兴师专文史科调干学习毕业，属嘉兴专署文教科分配，因我母亲年老一人在长兴老家无人照顾，写信给李焕书记要求把我分配到湖州工作。李焕同志回信说服我母亲要服

从国家分配，由此我留在嘉兴工作至今。李焕同志对自己子女亲友严格要求，从不搞特殊化。他的家族是大户人家，侄子侄女有 18 人，李焕同志“铁板一块”，从不插手用权安排一个人工作，都是他们自己奋发读书或艰苦努力出来寻找工作。他侄女李菊兰湖州师范毕业分配在吴兴县荃仁乡冷水村一所三复式小学任教师，学生 123 人，轮流上课，把李菊兰的喉咙都讲哑了，严重咽喉失声，无法再上课了，要求三叔李焕说句话，调个工作。李焕同志回信说：“共产党与国民党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共产党不搞裙带风”。小李老师实在不能上课了，由县文教局安排到练市区文化站工作。有次，李焕同志与吴兴县委书记赵星同志一起到练市工作，其侄女李菊兰在公社办公室对面的文化站办公室办公。李焕同志见了，怕影响她工作，就没向她打招呼，直到晚上休息时，才叫秘书把李菊兰叫来见面。菊兰到招待所一看，三叔睡的普通房间，只有一张竹榻，一只茶几，什么都没有，由此什么都不响了。李焕同志问她入党申请书写过没有？鼓励她要依靠党组织，向群众学习，积极工作，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李焕同志教育在嘉兴的两个儿子李建平、李卫平，下乡到大桥乡建国大队落户当农民。有次我在内招（现嘉兴宾馆）碰到李焕同志，交谈后，李焕同志知道我跟县委副书记樊家禧同志当秘书，在大桥乡工作过。他交代说：你告诉建平和卫平在乡下安心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不要以我的名义找人说话上来工作。他两个儿子在大桥公社（后改乡）劳动工作都很好，贫下中农都推荐他们参军、上大学，可是县里有关部门都未同意，李焕同志从未说一声。

1965 年 3 月，我跟县委副书记兼县贫协主席樊家禧同志到省

里参加浙江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李焕同志被选任省贫协副主席。休息时我到杭州市青年路红星里看望李焕同志，他见我马上从一把旧式滚椅里站起来与我握手，还向我母亲问好，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住的地方是居民住宅区，房子是旧的，不大，没有装修，没有浴室，也没有电器设备。我说：这样旧房子，怎么不要求搬到城里西湖风景区去呢？他回答说：房子虽旧但联系群众方便。他侄女李菊兰参加省里文艺大会演，在招待所病了，李焕同志骑自行车去看她。菊兰见了李焕同志来高兴地说：三叔，你怎么不开汽车来呢？李焕同志回答说：这是我私事，不是公事，怎么好用公车呢？李菊兰深受感动。

不久，“文革”开始，李焕同志派往浙江美术学院任党委书记。众所周知，浙江美术学院是浙江造反派策源地，斗批“走资派”是不管死活的。由于李焕同志坚持原则，正确说理，保护了一大批教授、画家、老干部，而自己却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急先锋”，“反动学术权威保护神”、“死不悔改走资派”三大罪名，背着三块牌子跪在桌子上被批斗。“造反派”把一瓶黑墨水倒在李焕同志头上，成了一个“黑人”。面对群众，李焕同志忍住心痛，坚持说理。“造反派”看他如此坚硬，斗批逐步升级，把李焕同志从“走资派”到打成“叛徒”隔离审查，外调人员一批接踵一批，训斥、逼供、套供，无其不有，都被李焕同志拒绝，保护了一大批曾出生入死、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老同志，李焕同志不愧为长兴人民的好儿子。

1972年春节，李焕同志被押送到湖州西门船厂“监督劳动”，我回长兴老家时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口口声声地说：李大队长是个好人，决不是坏人。并要我回嘉兴时途经湖州去看看

他，我母亲还要我转告他说：“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因当时我家乡农村文化大革命批斗我小时读书的王万祥老师上吊自杀了，我母亲出于关心李焕同志才讲了这句话。于是，我回嘉兴途经湖州到西门船厂去看望李焕同志。我见他在木工间小房子里，随口叫一声李书记！李焕同志摆摆手示意叫我不要叫，我们就站在门口谈了一些家常，我告诉他我母亲讲的一句话，李焕同志说：“共产党员不会轻易死的”。我看他身体这么虚弱，又黑又瘦，禁不住旧事涌上心头，面对那凄惨的苕溪掉下了眼泪。李焕同志对我说：怎么忍不住了！每当我回长兴老家去时，那里的老干部、新四军复员转业老战士尤松清、王阿三、王吾林、陈锦恒、王法林、王桂林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李焕同志从长兴地下党负责人、民主县政府县长、县委书记到全国解放后的湖州市委书记、嘉兴地委书记、省贫协副主席，几十年如一日，艰苦朴素，从没一点官架子，对上对下一视同仁，实事求是讲话，反映情况，又会讲普通话、长兴土话、河南话，还善于画画、写诗、唱河南调小戏，因此各方面人都同他合得来。

李焕同志自1952年开始患肝病，身体一直不好，带病工作，一次在湖州作报告时在讲台上昏倒抢救。1961年肝病第一次复发，组织上安排他到嘉兴光明街地区疗养院休息治疗；第二次肝病复发是1963年，省委领导下令“李焕必须休息”，才进杭州望江山疗养院治病休养，身体稍为好了一点，他就要求出院到长兴、平湖县搞政法调查，亲自接待来访人员，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由于“文革”中遭受严重身心摧残，“隔离审查”达六年之久，超越了他投身革命、直至抗战胜利的时间，于1975年3月第三次肝病发作，长时间高烧不退，又无人关心他，经浙江医院抢救无效，撒手人寰，于

1975年4月2日逝世，享年58岁。

李焕同志虽与我们告别27年了，但在今天我们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三个代表”中，回忆李焕同志先进事迹，犹如眼前，令人钦佩，深切怀念李焕同志，愿李焕同志在九泉之下含笑。

附：中共嘉兴地委书记李焕同志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走群众喜欢的路 加速消灭血吸虫病

李 焕

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报告，我们坚决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将坚决地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而进行斗争。

现在，我向大会报告一下浙江杭嘉湖地区向血吸虫病斗争的一些情况：

杭嘉湖地区是浙江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共有病人九十万左右，特别是嘉兴、嘉善、平湖三个县，情况更为严重，平均每十个人中有六个人害血吸虫病，青壮年十之八、九有血吸虫病。血吸虫病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和幸

福。我们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展开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以后，全区已经治疗病人二十二万，消灭钉螺二千八百万平方公尺。但是防治血吸虫病还是一个严重的任务，我们坚决遵循多快好省的路线，力争在两年内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这里，我想先说一说群众对治疗血吸虫病是多么迫切和需要。

“死人浜”、“荒田漾”——凄惨荒凉

嘉兴县有个净湘乡，血吸虫病流行了四十余年，那里的农民，贫病交迫，家破人亡，田园荒芜，呈现着一付凄惨的景象。这里有个环桥浜，当初经常死人，许多户绝种灭代。一九三八年前全村三十六户，到解放初只剩十六户了，其中只有一个全劳动力，所以当地农民都称它为“死人浜”。这里还有个石蟹村，抗战前还有三十多户，二百多人，到解放初只剩下十七户，六十多个人，有九户死得干干净净，许多房屋变成残垣废墟，荒芜了四百多亩田，大家叫这里为“荒田漾”。农民无可奈何，只得仰求关公大帝镇压瘟魔，但是“关公大帝”不显神威。农民只好四处逃命，流落异乡。

关帝哪能比毛主席

净湘乡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苦战，已经较彻底的消灭了血吸虫病。“死人浜”开始变成了“人兴浜”，废墟上建成了新屋，空地上种满了庄稼，全劳动力由一个变为八个了，还增种了十一亩田。那里的徐寿荣告诉我，原来他骨瘦如柴，奄奄待毙，人家叫他“死人坯子”，治病后体重净增三十五斤，变成了全劳动力，还讨了老婆成了家，他对党感激不已。石蟹村的“荒田漾”已开始变

“丰田漾”了，由以前亩产粮食百余斤提高到亩产五百八十斤了，这里的孙关荣诉说他从小随母亲讨饭，二十四岁还像个小孩子，体重只有七十多斤，不能劳动，治病后体重增到一百一十四斤，变成身强力壮的好小伙子，去年作了二千二百多个工分，他感激地说：“世上只有共产党才是救苦救难的大恩人”。

张家埭的张阿良，土改分到了田，也参加了合作社，可是血吸虫病害得他不能劳动，还是衣食无着。前年帮他治好了病，去年做了二千多个工分，添了五件新衣、一条新被，买了木床，修了漏房，他逢人就说：毛主席救了他两条命，一条是人命，一条是穷命。妇女陈福珍结婚十八年没有生育，夫妇不和，去年春天治好了病，冬天就生了个胖小孩，一家欢天喜地。群众说：“共产党领导，铁树也开了花”。

现在，关帝庙已冷冷清清，人们口口声声感激共产党。在人们的心眼里：关帝哪能比毛主席！

这个乡经过治疗的五千七百四十个病人中，有二千八百七十个人由半劳动力变为整劳动力；有一千一百四十八人由无劳动力恢复为半劳动力。全乡的单位产量由原先的三百多斤跃为五百七十六斤，不仅消灭了荒田，还开垦了五百多亩荒地。去年卖余粮九百四十八万斤，比三年前增加一百一十四万斤，八十多对因病不能结婚的青年也结了婚；前年十三个妇女因病不能生育，治病后就有十二个生育了。两年来全乡人口增加了一千一百多人，新盖房子一百五十多间，全乡由三所小学、一百五十四名学生，变为十六所小学、一千六百九十四名学生，今年还办了六个农业中学。他们正在热火朝天地争取实现千斤乡。

跃进一月，胜过两年

我们向血吸虫病作斗争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了，但是，过去和今天都带来两种不同的效果和经验。前两年共治疗七万病人，今年春季三个月共治疗四万五千病人，而四月份一个月却治疗十万五千病人。如果按月份比较，四月份相当于今年前三个月的七倍，相当于前两年的三十六倍。当前广大农民、医务人员、农村干部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积极性是高涨的，血防工作计划和其他计划一样，一再被突破，真是轰轰烈烈，一日千里，它汇同其他工作一起，出现了一个空前跃进的局面。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这种跃进的局面呢？

身体也要大跃进

血防大跃进，是随着生产大跃进而来的。嘉北乡一个社员徐昂英说得好：“生产大跃进，身体也要大跃进”。广大群众深深懂得要加速建设步伐，必须要有健全的体质。许多病患者看到别人轰轰烈烈地干，自己不能卖力，内心很不痛快，“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在起劲干，我只吃不做，想想很难过”。特别是一些青年晚期病人，原先对个人前途悲观失望，这次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他们也拍着大肚子要求治病。嘉北乡一个青年说：“我还年轻，要过社会主义生活，就坚决要治病”。现在的情况是：那里的生产劲头特别大，那里群众对治病的要求也就特别大。

但是，对于广大群众这一迫切要求，开始时并不为所有的同志所了解。不少干部只看到眼前的劳力紧张，片面地认为血防工作与生产大跃进有矛盾，要搞生产，就不能搞血防。有些干部公开说：

“农业纲要我条条赞成，就是对血防工作有意见”。“现在农村工作是搞生产，还是搞治疗血吸虫病？”许多医务人员也是不甚明白生产和血防的关系，以为群众“迷信”“落后”，不要求治病。但是，党抓住了群众的心愿和要求，抓住了劳力和生产的关系，介绍活人活事，组织专题的辩论，一般同志能够明白生产和血防相结合的道理以及生产与治病在劳力安排上两不误的办法。因此，许多乡社干部在搞通思想以后，改变了原来落后的计划，许多乡总支书记亲自到合作社去组织和动员群众治病，有的同志还以自己治好血吸虫病的切身体会，到处现身说法，动员病人。医务人员在搞通思想以后，纷纷递交决心书，要求深入农村支援生产大跃进，并且展开了双比竞赛运动，他们正在废寝忘食地紧张地进行治疗工作。

树立了生产大跃进思想和明确生产大跃进与身体也要“跃进”的关系，正是广大干部、群众和医务人员鼓足干劲的基本原因。前两年由于我们缺乏这个明确的观念，所以劲头不足，计划保守，慢慢吞吞，进展迟缓。

走群众喜欢的路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大跃进除了鼓足干劲以外，还要采用多快好省的工作方法。

过去医疗工作的特点是：摆出医院架子，蹲在城镇，等客上门，长期疗程。那时医院都设在城镇上，无论国家医院或联合诊所，都摆出大医院的架子，都设有病房、病床、病人膳食，一套陈规旧习；特别是长程疗法和休养时间至少要三十天，影响生产，化费很大。如嘉兴血吸虫病防治医院设二百多病床，三百多个医务行政人员，

每个病人一进院就得先化三十元的住院费(不包括医药费),一年只能治二千多个病人。新丰乡联合诊所也按照这一套旧办法,住在镇上,五六年下半年八个医务人员治疗一百九十五个病人,化了四千多元,每个病人平均负担二十七元,农民很有意见。这是过去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少慢差费的重大原因。

今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医务人员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也来个翻身。目前的工作方法是:深入农村,送药上门,结合生产,短程疗法。现在普遍采用深入农村,就地设院,一组多点,巡回治疗的方法,一般都采用二、三日疗法,共需六、七天,就可以恢复劳动,时间短,化费少,群众鼓掌欢迎。嘉善天凝乡王苏台血吸虫病防治小组,四个医务人员,还培养了社的两个保健员,有一期(六天)收了一百九十七个病人,按自然村分六个点(小病房)以及十九户送药上门;他们以民房庙宇当病房,门板作病床,自带被服伙食;他们运用二日疗法,六日出院,病人负担只有一点八元。他(她)们也想出了很多办法,克服困难,在处理急病时,采用各点白日插红旗,夜间挂红灯的信号联络办法;护士量体温和注射的速度很快,超过了过去的规定,从未发生医疗事故。医生在大雪天滚在河里,不回来换衣服,还坚持去治疗病人,护士们挑水、烧饭,什么也干。不论大雪大雨,他(她)们深夜到各村轮流工作,他(她)们坚持三十九个昼夜,群众很受感动。

目前由于打破了陈规旧习,医生下乡治病,坚持先进疗法,真正为生产服务,因此才能出现一个热热闹闹、多快好省、群众拥护的新局面。

正因为采用了多快好省的方法,干部也欢迎,农民也喜欢。时